

中國近現代史論文集

河南大學科研處 歷史系

一九八五年

中国近现代史论文集

科研处、历史系 合编

河 南 大 学

一九八五年六月

目 录

辛亥革命前后的妇女运动·····	荣铁生 (1)
戊戌变法与官制改革·····	吕美颐 (29)
爱国志士邱逢甲·····	张九洲 彭乃坤 戴 鹏 (44)
试谈义和团与宗教迷信·····	张九洲 (58)
孙中山教育思想·····	黄保信 (71)
张继端民主革命思想述略·····	黄保信 (87)
中国现代史体系问题刍议·····	李光一 (96)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光辉历程·····	靳德行 秦英军 (112)
试论毛泽东军事思想对马列主义军事学说的重要发展 ·····	黄元起 (126)
论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中的农民问题·····	黄元起 (138)
浩歌正气下中原·····	(152)
——少奇同志抗日战争时期在河南的革命实践·····	靳德行
近代中国“科学·民主”与“迷信·专制”的斗争 ——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	秦英军 (161)
鲁迅早期的科学思想初探·····	朱维娴 (173)
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破产·····	李光一 (182)
一九二五年——一九二六年的关税会议与法权会议 ·····	李光一 (202)
评价陈独秀的几个问题·····	靳德行 (219)

试论戴季陶主义的出现及其反动实质·····	杨天德 (230)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几种政治主张 ·····	秦英军 (246)
毛泽东同志民主革命时期对马克思主义农民问题理论的 运用和发展·····	靳德行 秦英军 (254)
五卅运动在河南·····	李光一 (267)
试论国民党南京政府的改订新约运动·····	李光一 (284)
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科学和史学概论研究的关系 ·····	黄元起 (296)
论历史研究与现实的关系·····	黄元起 李振宏 (312)

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妇女运动

荣 铁 生

十八世纪，中国封建社会内部一度遭到阻碍的资本主义幼芽，又开始缓慢地、稀疏地萌发，经过两千多年不断强化、修补的封建伦常，明显地出现了裂缝，开始透出缕缕清新空气。往常视为神圣的封建教条，遭到了怀疑、嘲弄和批判。呻吟在封建重压下的妇女解放问题，引起了人们更多的关注：从十八世纪开始到鸦片战争前夕，我们可以排出一长串名单。其中著名的有塑造了林黛玉、晴雯、尤三姐等众多封建礼教叛逆者形象的《红楼梦》作者曹雪芹（1715年——1763年？），主张男女社交自由、反对夫死殉节的思想家汪中（1744年——1794年），反对穿耳、缠足、算命合婚的《镜花缘》作者李汝珍（1763年——1830年），经学家俞正燮（1775年——1840年）在《癸巳类稿》、《癸巳存稿》中撰有多篇论文，则是他们当中的杰出者。他认为“古言终身不改，言身，则男女同也。”因此允许妻死夫再娶，苛求男死女不嫁是“偏义”；① 妇女的“妒”是多妻制度造成，把“妒”的“恶德”强加于妇女“非通论也”；② “古有丁男丁女，裹足则失丁女，阴弱则两仪不完”。③ 从这个名单可以看出，同情和主张妇女解放的进步思想不仅是前后相映互相衔接的，而且随着历史的进展，也是愈演愈烈的。但当时的中国还不具备容纳这种进步

①俞正燮：《癸巳类稿》卷13《节妇说》，商务印书馆版。

②俞正燮：《癸巳类稿》卷13《妒非妇女恶德说》。

③俞正燮：《癸巳类稿》卷13《书旧唐书與服志后》。

思想的阶级和社会，这些进步思想只能成为时隐时现的潜流。而披挂着经学外衣的妇女解放理论，则长时间被尘封在宁静的书斋。

鸦片战争后十年，发源于广东一隅之地的太平天国运动，席卷了大半个中国，中国妇女以空前的规模投身于革命洪流。她们以自己实际行动获取了社会地位和精神面貌的巨大改观。但是，太平天国并没有也不可能提出男女平等思想。洪秀全在《原道醒世训》中说：“皇上帝，天下凡间大共之父也。近而中国是皇上帝主宰化理，远而番国亦然……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何可分尔吞我并之念。”细揆文理，这里强调的是人人都是上帝的“赤子”，人人在上帝面前平等，而不是男女平等。《天朝田亩制度》中规定了“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妇”显然是承认了金田起义以来广大妇女所建立的功勋，但同样也很显然，两广和长江中下游太军行军所到之地，广大劳动妇女长期以来是田间的主要劳力。这里，主要强调的是分田，而在分田过程中是不可能排斥妇女所得的一份的。历次农民起义中，劳动妇女是积极的参加者，妇女在农民起义中历来有较高的地位，过去的农民运动这么作了，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也是这么作的。它的规模之大、范围之广是远远超出历代农民起义，但并未提出近代意义的男女平等观念。相反，我们倒是看到太平天国官书中存在的大量的封建的男女观。如：“牝鸡司晨”家道苦，“抬眼看丈夫”该打等等。太平天国的妇女问题是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一部分，尽管它的成就空前，却并未超越农民运动。随着太平天国后期向封建化的演替，服从于农民运动的太平天国妇女解放作为一个整体，同归于失败。

近代意义的妇女解放应该从十九世纪末叶的维新变法运动前后说起。

中国近代意义的妇女解放运动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到一

定水平的基础上的产物，也是中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民族矛盾急骤上升的产物。十九世纪末是它的启蒙阶段，辛亥革命前后形成高潮，随即转入无产阶级领导的妇女解放运动。二十余年的时间演示了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妇女解放运动的全过程，它的成就甚伟，同时也是来去匆匆的。

十九世纪末叶的维新变法是一个爱国的、进步的政治运动。康、梁、谭、严诸维新志士，相当自觉地把妇女解放看作维新变法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对待妇女问题，大大越过了前人止于同情、怜悯和企图向经学中求援的窘境，而是运用新的思想武器把这一问题和整个社会联系起来考察。他们把西方阶级的“天赋人权”和进化论学说引进了中国，并用之他们的维新事业，包括妇女解放这一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武器，在当时的中国是崭新的、犀利的，曾打动了多少苦于探索救国救民的志士仁人，把他们引向斗争的道路。

康有为写了《大同书》，其中《戊部 去形界保独立》二万五千言，如再加上《己部 去家界为天民》，大笔淋漓，洋洋六万言，直算得一部妇女问题的专著。他反复强调：“人者天所生也，有是身体即有其权利。……男女虽异形，其为天民而共授天权一也。”^①他在“天赋人权”的思想基础上，大胆地、全面地提出了妇女的各种“苦”，这些“苦”，反过来即是妇女解放和种种要求。这些“苦”是：“不得自立，不得任公事，不得为仕宦，不得为国民，不得预议会，甚至不得事学问，不得发言论，不得达名子，不得通交接，不得预享宴，不得出观游，不得出室门，甚至斫束其腰，蒙盖其面，刖削其足，雕刻其身……。”他表示决心，立下大愿，要为“女子呼弥天之冤”，要使女子“致之平等大同自立之乐。”^②《大同书》成书较晚，为1901年至1902

①康有为：《大同书》，古籍出版社页126。

年氏康氏避居印度时所撰，而孕育则早在1884年顷。康有为在政变前写有《人类公理》，要求“平等公同”，同时发起不缠足会等，应该说，康有为的男女平等思想在戊戌变法前，就已形成了。他们的这种思想对康门弟子和当时的维新派是有影响的。梁启超的一些有关妇女的言论，多本于康氏，只是更多地把这一问题在国内外的实际结合起来，使之更富有社会意义。自称康氏“私淑弟子”的谭嗣同，明白提出：“男女同为天地之菁英，同有无量之盛德大业。”①他勇敢地提出要以“无纤毫之苦，有淡水之乐”，不失自主之权的“朋友”②一伦取代君臣父子、夫妇封建伦常。以不失“自主之权”来改建夫妇间的主奴关系，是极为大胆、激进的，是前所未有的一种新的男女观。谭嗣同没有把男女不平等的现象孤立地、或平列地加以抨击，而是看作封建伦常总体中的一部分，重点则直逼君臣一纲。这一点，比康有为走得更远。

他们以不缠足、办女学当作实行男女平等的开步走，并在其中阐发了他们有关妇女解放的主张和观点。

1898年7月康有为曾上书禁缠足，他说：“妇女缠足……流传孙子，奕世体弱，……羸弱流传，何以为兵乎？……今当举国征兵之际，留此弱种，尤可忧危。”③他们把这一问题和中国的“积弱”联系起来。1884年，康有为家居，就发起了一个“不裹足会”。一个参与发起者，格于清政府禁止集会的律令，畏难退缩。康有为抵住社会压力，先从自己的女儿、侄女作起。康有为的上书请禁，“虽不施行，而天下移风”。④上海、天津、江

①②《仁学》，《谭嗣同全集》，三联书店页19、22。

③康有为：《请禁妇女裹足折》，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二）页243。

④康有为：《大同书》页141。

苏、福州、长沙、广东和新加坡的华侨中，纷纷出现“天足会”、“不缠足会”等团体。梁启超、谭嗣同于1897年在上海成立不缠足总会，大声疾呼。湖南省搞得最认真，最有生气。唐才常在长沙办《湘报》，宣传放足，唐自誓：“及吾身而不强聒天下回兹浩劫，则生生世世永坠地狱，不复为六根六尘伍矣。”^①他们免费送《不缠足歌》、发动鞋店出售新款式的放足穿的“云头方式鞋”。署湖南按察使黄遵宪出示劝谕。《湘报》陆续刊出的不缠足会题名录和捐资、发起者，达一千三百余人。^②甚至偏远的山区，如善化县西乡仙庚岭也有了不缠足会团体出现。湖南是当时的维新派最活跃的省份。就全国来看，发展极不平衡，“开会者不过通商数区，人会者不过通人数辈”。^③但，风气已开，不可遏止。不缠足是对夫权的否定，妇女觉醒的表现，在十九世纪末是件反封建大事。它看来不是件政治事件，但无论提倡者和反对者却把它看作政治问题，是有关保国、保种、保教或维系世道人心的大事。它和几年后的男子剪辫一样，是巨大的政治。

甲午战争后，随着维新思想的迅速高涨，办女学作为一个新事物被提出。什么是女学？梁启超有如下的理解：古代“批风抹月，拈花弄草，能为伤春惜别之语，成诗词集数卷”，只能是“才女”，而不是“女学”。“女学”是“内之以拓其心胸，外之以助其生计”，“知有万古，有五洲，与夫生人所以相处之道，万国所以强盛之理”。^④就是说，具有广阔的近代知识始为“女学”。他把办女学和他的维新事业紧密结合，梁说：“治天下之大本二，曰正人心，广人才。而二者之本，必自蒙养始。蒙学

①唐才常：《书洪文治戒缠足说后》，《湘报》第17号。

②《湘报》，1898年3月7日发刊，同年10月15日停刊，共177号，几乎每期有题名。

③康同薇：《女学利弊说》，《知新报》52册，光绪24年闰3月。

④梁启超：《变法通议》，《饮冰室合集》文集一页39、40—41。

之本，必自母教始，母教之本，必自妇学始。”“今之忧天下者，则有三大事，曰保国、保种、保教。……种乌乎保？妇学为保种之权舆也。必使其种进，而后能保也。”^①应当说，这种认识是当时维新志士共同具有的。康、谭、严诸人莫不如此，严复说得更直白些：“母健而后儿肥，培其先天而乃种进也。”^②这里，我们看到，维新志士是用“物竞于择，适者生存”的武器披挂上阵的，他们把妇女问题和挽救民族危亡联系在一起，赋予了鲜明的爱国主义色彩。

这样的第一个女学——经正女学，1898年6月在上海正式开办。主其事者为维新派人士经元善。筹备期间曾约“西妇”数十人讨论办学方案。经正女学大体上按教会女塾的模式办理的。^③但，这不能说是“照搬”或“抄袭”，严格说来，历史上何曾有过“照搬”或“抄袭”？有的只是“拿来”加以改造，其区别仅在于是“拿来”，把社会引向前进还是拉向后退。维新派拿来

①梁启超：《变法通议》，《饮冰室合集》文集一页39、40—41。

②严复：《原强》，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三）页55。

③1845年英国教会组织“东方妇女教育促进委员会”委员爱丛德塞（Aldersay）在宁波办了一个女塾，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女学。此后美英教会在沿海一带陆续办女塾。这类学生据统计到1866年有女学生576人，1877年增至2064人。《东方杂志》三十一卷第七号《女学生声》一文把1900年前华南、华中、华北五个美国教会学校的课程作了介绍，计有：体操、音乐、地理、生理、天文、化学、物理、动物、算术、卫生、历史、英文、道学等课目。其中道学是指宗教考及宗教活动，不论课内课外，均占很大比重。教会办学是为了传布“福音”，为帝国主义利益服务，但客观上也传播了科学知识。科学和知识本身是一种解放力量，正如愚昧必然伴随着落后一样。最早掌科学知识的人，往往也是新鲜事物的最早接受者。中国最早一批不缠足女子出现在教会女塾，中国最早的自办的女学教师，和最早的一批职业妇女，也多出身于教会女塾。

的是女学的管理方法、课程开设,而其办学方针则是把女学纳入维新变法的总体之中的。这样,目的在于保国、保种、保教、培养妇女自立能力的近代女子学校出现了。从经正女学开始到辛亥革命前夕,兴办女学成为当时一种最高尚的事业。不少仁人志士毁家兴学,甚至以身殉学。①兴女学终于蔚为风气。除上述经正女学外,上海有爱国女学、务本女学、城东女学、宗孟女学,北京有京师女子师范,天津有北洋女子师范、公立女子学校,南京有旅宁女学,汉口有淑慎女学,长沙有周南女塾,济南、重庆、杭州皆有女学出现。内地和比较闭塞的地区,时间较晚一些,也有女学兴办,如河南较早的女学——华英女学是刘青霞女士1909年在尉氏县城办的,教师聘有日人,学生五十余。②这些女学的创办人,在政治派别上,有的是维新派,有的是革命派,但其为资产阶级的新式女子学校则并无二致。从它的课程设置来看是相同的。以爱国女学为例:本科(文理分科)的文科设伦理、心理、国文、外国文、数学、历史、地理、家事、教育、唱歌、图画、体操;理科设伦理、外国文、数学、历史、地理、博物、物理、化学、教育、裁缝、唱歌、图画、体操。③当然,不可能每个女学都能把这些课程开齐。它已具有了近代女子学校的性质是极为显然的。女学的兴起不仅给不缠足扩大了阵地,也使妇女的精神面貌大有改观。她们开始接触到近代的科学和文明,她们在课余之暇,公然参加远足、游艺、演说,甚至开运动会。当时一些杂志曾刊有

①《东方杂志》3卷5号《惠馨女士殉学记》:惠馨女士于甲辰(1904)在杭州延及绅士创办杭文女学,“自割其臂,表示学校中止,即以身殉。”乙巳(1905)年因学校缺常年收入,惠馨女士服毒自尽。当时兴学有维新派、革命派和部分在旗的开明人士,形成一种民族自救的运动。

②贺升平:《辛亥革命时期的刘青霞》未刊稿,稿存河南省政协。

③《记爱国女学校》,《女苏报》(1903)4号29页。

她们上述活动的照片。当我们看到她们带着一些惊恐的神色出现在体操场上时，使我们深切感到：中国妇女运动毕竟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了。

维新志士的兴女学、不缠足为主要内容的妇女解放运动，还仅仅是开了一个头，还处于启蒙的阶段。这表现了运动的倡导者主要还是几个男性“通人”，尚未达到妇女自己起来求得自身解放的阶段。与此相联系，在这些“通人”看来，与其说解放妇女无宁说是解放男子。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社会极度动荡，谋生日益艰难。牧歌式的含情脉脉的大家庭早已是失去的天堂。历来是一家之主的男子，已拖拉不起沉重的家室之累。他们对女子依赖男子的老规矩，感到压力极大，女子“全属分利，而无一生利者”^①的局面迫切需要改变。男子对“三从四德”也颇为不满了：“三从，则实为三累，未嫁累其父，既嫁累其夫，夫死累其子。”^②因此兴女学也好，禁缠足也好，是从“略息男子之仔肩”出发的。梁启超明白宣示，办女学的好处是：“上可相夫，下可子教，近可宜家，远可善种。”^③这是近代妇女运动中的反调“贤妻良母”主义最早的表述形式。这种“贤妻良母”主义在稍晚一些时候，又和从日本传来的贤妻良母主义相结合，成为反对妇女解放的最主要的武器。说“贤妻良母”主义之为非，并非主张悍妻恶母，而是在于近代历史上，每逢革命紧要关头，广大妇女奋起斗争之时，贤妻良母主义总出来喧嚣一阵，千方百计把妇女从广阔的社会活动中拉回厨房，主持“家政”。维新派在妇女解放问题上有两个截然相反的命题：一个是号召妇女自养、自立，这是进步的一面；一个则是请她们仍然回到家庭去，重做封

①梁启超：《变法通议》，《饮冰室合集》文集一页38。

②勇立：《兴女学议》，《东方杂志》（1907）3卷13号《社说》栏页242。

③梁启超：《倡设女学书》，《饮冰室合集》集文二页19。

建制度的奴隶。这一时期组织的“不缠足会”、“天足会”等，还不能称为一个妇女团体，它是一个开明家长之间的君子协定、“婚嫁章程”。他们相约自己的女儿不缠足，儿子要娶不缠足的儿媳。妇女自组团体、自求解放是二十世纪初年才发生的事。

《辛丑条约》后，近代妇女解放运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辛丑条约》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一步加深，民主革命正在蓬勃兴起，清政府为了适应帝国主义的侵略要求和梦想抵制行将到来的民主革命高潮，宣布实行“新政”。其间，清政府把兴学堂、奖游学作为“新政”的主要内容。中国迅速形成了一个青年知识分子群和青年学生群。辛亥革命前夕，全国各类学校在校人达一百五十六万人。^①1906年中国留日学生约万人，女学生约百人。日益激化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使这些青年很快摆脱维新思想日趋革命化。女学生开始办杂志、组团体，很快走向社会，“男界”知识分子也成为妇女解放的同情者和赞助者。

留日女学生是一个非常活跃的力量。日本明治维新后，妇女运动兴起，福泽谕吉和森有礼诸人提倡女权，主张人类皆有自由自主权利，展开了争取女权运动。怀着寻求救国救民的要求解放的青年妇女到了日本。受到明治遗风的刺激，他们迫切要求把这种新风移植到灾难深重的祖国。国内以上海和长江中下游一带女学较多的地区，也积极行动起来，她们开始筹办报章杂志，逐渐取代“男界”倡导妇女解放并代为立说的局面。1902年《苏报》主编陈范之女陈撷芬主办《女苏报》，在上海出版。接着《女界月刊》、《北京报》《中国妇人小杂志》、《女界钟》、《二十世纪之中国女子》、《新中国女界》先后在上海、北京和日本出版。1907年秋瑾在上海创办《中国女报》和后由秋瑾学生创办的《神州女报》尤为著名。当时创办一个杂志极为困难，不说封建

^①陈育之：《中国教育史》页620。

势力的阻力和习俗压制的阻挠，仅经费一项，便足致扼杀。如秋瑾创办《中国女报》，原计划集股万金，结果只有四、五人入股（每股二十元）。很多杂志办了两三期便被迫停刊。有的创刊号同时又是终刊号。她们首饰卖尽，家产当光，告贷无门。但，一个刊物停了一个又创办起来。象接力赛跑一样，所不同的是接棒者并非一人，她们有的在国外，有的在国内，有的在南方，有的在北方。这些由妇女自己起来创办的报章杂志，表现了妇女本身极大的自觉性和主动性。金一写的《女界钟》宣传妇女参加革命，要求妇女摆脱奴隶地位、社交公开、参与政治、婚姻自由，他主张教育女子要有八条“标准”：

“一、教成高尚纯洁完全天赋之人；

二、教成摆脱压制自由自在之人；

三、教成思想发达具有男性之人；

四、教成改造风气女界先觉之人；

五、教成体质强壮诞生健儿之人；

六、教成德性纯粹模范国民之人；

七、教成热心公德悲天悯人之人；

八、教成坚贞节烈提倡革命之人。”^①

这八条“标准”提出了“天赋人权”、民主、自由以及新的道德观和贞节观等诸问题，带有妇女解放纲领性质。把妇女解放的视野大大开拓，已不满于维新志士们在爱国大旗下给她们扮演的角色——生一个肥壮的儿子。妇女的许多切身问题提出了。

经济独立和人格独立问题“我们女子不能自己挣钱，又没有本事，一生荣辱要靠之夫子，任受诸般苦恼……”，^②“欲脱男子

①转引谈社英：《中国妇女运动通史》，女子共社鸣页5。金一，男性，中国教育会成员

②秋瑾：《敬告姊妹们》，《秋瑾集》，上海古籍出版社页15。

之范围，非自立不可，欲自立，非求学艺不可，非合群不可。”^①这是一个老问题，维新志士们已经提出，也是一个最容易淹没在空话和幻想里的平常道理。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资本主义发展水平不高，资产阶级革命理论准备不足，同时中国的现状又是民族和阶级矛盾异常尖锐。在此情况下，老问题总是不断当作新问题提出，出现一种早熟现象：问题提出很早，走得很远，却又很快被遗忘，又不断重新提出，重新付出代价，长期反复补课。经济上不能独立，精神上还处于奴隶状态，妇女解放将永远是一句空话。在当时，她们本身就不乏这种经验教训的。1911年春《留日女学会》杂志就说：“若徒依赖男子，希望官吏之提倡，则今日男子官吏，对于女子教育，内有各省之摧残，外而使臣之忽视，毫不关心，漫云培养。”^②妇女不能自立，人格上还处于依附状态，永远不能解放，娜拉走不出家庭，即使走出，也将是一场悲剧。尤其是提出了“合群”的思想，表明妇女在斗争中逐渐了解到组织团体的重要性，这应是妇女运动走向自觉的重要标志之一。

家庭革命和婚姻自主问题 秋瑾的好友吴芝瑛在秋瑾身殉革命后，曾有一诗悼念：“伟哉秋女士，抗心誓雪耻，振臂而疾呼，家庭革命始。”^③中国封建社会延续了两千余年，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家庭”是最小也是基层的社会组织，婴儿呱呱坠地，“家庭”便吐出千万条丝缕，把人网织在蚕茧之中，尤其对妇女说，“种种家庭教育，非贼形骸即锢知识”，“女子一生被父母爱者独多，受父母罪者亦最酷”。女子结婚必得父兄“全权之承诺”，丈夫是“第二君主”。他们疾

①秋瑾：《致湖南第一女学堂书》同上书页32。

②转引谈社英：《中国妇女运动通史》页22。

③惠毓明编：《吴芝瑛传略》（万柳一角）页21。

呼：“宁断爱情，不受压制，能去压制，始长爱情”。婚姻自由为“吾国最大问题，而必为将来发达女权之自始。”^①在封建重压下的妇女是丝毫不能越一点轨的，举手投足，甚至一动念间，无不在网罗之中。“家庭”总是封建礼法的最坚决的护法神的殿堂，不冲破家庭这一以宗法的、脉脉含情的绳索织成的网罗，一切谈不到。整个中国民主革命一再说明这一事实。“家庭革命”往往是民主革命的开步走，而婚姻自主也总是家庭革命的主要内容。

女德问题 辛亥革命前后，女界先进经常提出“养成国民资格”、“完全的国民”等问题。这一问题内涵极广，主要包括要求男女平等，争取自由、民主等诸范畴，也包括树立一个新的道德风貌的“女德”问题。封建社会宣扬“幽”、“淑”、“贞”、“静”的“女德”，反之“妒”、“媚”、“阴”、“懦”则是不德。这种奴隶道德理应遭到批判。她们认为：“德无分于男女也”。“德者人之所得于天”，是天赋的人权，男子不能将“天之所予者而夺之”。所谓妇女的“不德”是男女不平等的结果：“妒起于不平等”，“媚起于不独立”，“阴起于不履外”、“懦起于不阅事”。他们提出的新女德是：“反乎妒者曰慈爱”，指的是爱国、爱民和同情心；“反乎媚者曰高尚”，指的是：“不畏人欺凌，亦不受人保护”；“反乎阴者曰狭（侠）烈”，指的是：“有恶声加吾身者，吾必反之。有异族辱吾国者，吾必报之”；“反乎懦者曰勇毅”，指的是将“守死不嫁，抚呱呱之儿以终其身者，扩而大之，以当今日之大难。”^①

①丁我初：《女子家庭革命说》，转引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卷一下页925—929，后简称《时论》。

①巾幅：《女德论》，《中国新女界杂志》第1期光绪32年12月页5—9。

慈爱、高尚、侠烈、勇毅，描绘出一副全新的新女性的道德观。它大大超越了半个世纪前妇女解放先驱者俞正燮提出的观点，也冲破了维新志士们所设下的“贤妻良母”的樊笼。

废止奴婢和娼妓问题 1903年上海“卖淫妇之等级不下数十百种……政府置之不闻，自无足怪了。乃至政家，亦并无一言及之！”^②“买卖人口之陋风，富文明世界之玷，实人道之蠹贼。”解决问题的“完全之策”，则在于“惟有速兴女子教育，速振兴实业，速谋女子职业……”。^③

以上种种，说明她们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勇气向社会申诉、声辩和抗争。1907年1月号《中国女报》发表了一篇《大魂篇》的文章。号召妇女争取民主，并且“还以助男子，共争主权于异族。”在民主斗争中“当仁不让，夫何吝于先着鞭”。^④她们从家庭革命起步，终于和民主民族革命的洪流汇合在一起。

当她们创办杂志大造舆论之时，同时也是她们积极投入爱国和革命运动之时，也是她们组织团体积极谋求自身解放之时。

关于妇女在辛亥前后的活动，我们除革命家秋瑾之外，几乎一无所知。^①史实散失，加以根深蒂固的偏见，吉光片羽，连掇为难，我们只能知其大概。

1900年唐才常在汉口发动自立军起义，事泄失败，周福贞、毛芷香、刘惠芳殉难，1918年湖南三育学校校长熊周炳，迎三烈士木主入祀女烈士祠。

妇女积极参加了1901——1905年的拒俄运动。义和团反帝爱

① 邈公：《上海之黑暗社会自序》，《时论》卷一下页719。

② 亚震：《奴婢废止议》，《时论》卷三页383—384。

③ 黄公：《大魂篇》，《时论》卷二下页844。

④ 谈社英在编《中国妇女通史》时，即慨叹收集史料之难，时在1936年，去辛亥革命未远，谈本人即为当时著名妇女活动家，《民立报》记者。